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非产能合作与非洲工业化

廉超群

内容提要：中非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中国对非宏观政策的核心主题之一。它既能助力中国经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又有助于非洲工业化与非洲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具有实现中非双赢和共赢的潜力。然而，对这一合作的理解，很容易陷入国际产能转移规律或大国崛起与扩张规律这两个诠释陷阱，并继而损害“一带一路”构想的战略价值，因此有必要从非洲和中国的实际需求和现实状况出发重新梳理该合作的目标、模式与内容。本文通过总结非洲工业化的历史，指出非洲国家亟须改变一直以来依附于世界体系核心圈层的被动工业化模式，并认为向这些国家传递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积极经验，将有助于它们对自主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关键词：中非产能合作 自主工业化 被动工业化 现代化理论 依附理论

一、中非产能合作的必然性

中非产能合作是近年来，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中国对非宏观政策的核心主题之一。2014年5月8日，李克强总理在第二十四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上的致辞中表示：“非洲有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在这些方面，中国有较强的投资建设能力和富余产能……非洲振兴的关键在发展工业。我们支持合适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非洲转移……”¹ 2015年12月4日，习

廉超群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

1 李克强：《共同推动非洲发展迈上新台阶——在第二十四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4年5月9日第2版。

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开幕致辞中指出：“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正处于工业化的兴起阶段。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拥有助力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装备、人才、资金等物质优势，更拥有支持非洲发展强大的政治优势。中非合作发展互有需要、优势互补，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¹ 他随后提出中非间的“十大合作计划”，其中居于首位的是致力于“积极推进中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的“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² “积极开展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共同推动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写入了峰会结束后发表的宣言中。³

中非产能合作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政策关注度，是因为这一合作内含着一种由合作双方在需求和利益上高度契合而得以最终实现双赢和共赢的近乎完美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使得中非产能合作对践行以双赢和共赢为目标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的先行与示范作用。具体来说，中非产能合作主要体现在中国向非洲国家转移产能，这一方面有助于消化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改变非洲长期以来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的局面，促进非洲的工业化，并从根本上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来看，这一合作符合双方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切实利益，有实现双赢共赢良好效应的潜力。而双赢和共赢恰恰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试图打造的理想境界，既彰显了这一战略构想所秉持的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理念，也突出了该构想摒弃以恃强凌弱、零和游戏为特征的传统大国扩张模式的特点。

然而，再完美的必然性，也需要中国和非洲国家从各自立场出发捋顺内在逻辑关系，在合作的实践中通过切实满足双方需求、保障双方根本利益才能实现。如想当然地以必然性为必然，急于推动中国剩余产能向非洲转移，则有可能坠入两种相互关联的经验主义诠释陷阱中，进而削弱实现双赢与共赢的可能性，对“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和战略理想带来伤害。

二、两种经验主义诠释陷阱

这两种经验主义诠释陷阱分别是产能国际转移规律和大国崛起与扩张规律，之所以称它们是“经验主义”，是因为两者都是对以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历史的经验性和规律性总结。

所谓产能国际转移规律，即高收入工业与制造业大国在面临由国内产能过剩

1 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5年12月5日第2版。

2 同上。

3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年12月10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23144.shtml>，2016年3月13日访问。

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低收入国家，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完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升级；而中低收入国家可以在这一过程中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在劳动力价格上涨到瓶颈阶段时，再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董小军总结了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所经历的五次大型产业转移：一是19世纪下半叶钢铁产业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二是20世纪中叶，钢铁和纺织等传统产业从美国转移到德国和日本；三是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和德国将以轻纺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四是20世纪80—90年代，一方面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将“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另一方面“四小龙”承接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和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并且把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五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世界工厂”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上升，加之欧美等国认识到了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致使“产业高端链条回流欧美发达国家”，而“产业低端链条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¹

如果仅按照上述规律来理解中非产能合作，中国如果将过剩钢铁、建材和纺织产能转移到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又亟待发展工业的非洲国家，无疑属于全球第五次产业转移中的“产业低端链条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这种转移模式，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支撑，也似乎成为发展中国家高效快速地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最佳选择，但它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全球化过程的体现，尤其是全球市场分工的体现。这一分工的基本特征是：产业与产能在各经济体之间的分配与转移，并不是基于各经济体根据自身状况、经平等协商而完成的自主性选择，而是由位于世界体系核心的拥有强大资本与话语权的国家所主导的结果。这种分配与转移，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球经济和劳动力资源的高效配置，但实际上却使得核心国家继续享有最优的产能配置和社会繁荣条件，而将导致资源侵蚀、环境恶化和劳动力剥削的产业转移至核心圈层以外的中低收入国家；这些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固然能因其低廉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实现快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但在到达发展瓶颈时，若想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环境民生则不得不重复产业转移的套路，在摆脱快速发展的负效应的同时，将产能转嫁给位于全球产业链条更低端的国家。

在所谓产能国际转移规律的诠释下，中非产能合作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业与产能分配调整的自然结果。由于这一规律认定美国、日本、德国、“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产能国际转移，因而人们会视

1 董小君：《通过国际转移化解过剩产能：全球五次浪潮、两种模式及中国探索》，《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55期，第3—18页及第53页。

非洲承接新一轮产能转移后的崛起为必然并因此欢欣鼓舞。然而，这仅仅是历史经验的积极面。如果接受基于这种历史经验的规律诠释，那就意味着也须接受这一历史经验的消极面，也即非洲将会无可避免地承接因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中非产能合作双赢共赢的美好前景将会因此而黯然失色。这就是先前所提到的第一种经验主义诠释陷阱。

与这一诠释陷阱密切关联的，是同样基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历史发展经验的所谓大国崛起与扩张规律。这一规律基于世界体系中核心与边缘圈层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它显示出，一国的崛起若不能重构世界体系，则必然会在维系现有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与层级的基础上向体系的核心迈进，而这一过程将以控制和剥削边缘国家为代价。这一经验规律是对16世纪以来世界殖民史和帝国史的总结，其简单直接的规律性是一把双刃剑，一边从反殖民、反霸权的政治伦理制高点对核心国家的控制和剥削行为进行批判，另一边也削弱了核心外其他国家的崛起过程同既往历史经验间的异质性，将其他国家的崛起视作“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这后一种逻辑，恰恰是某些言论误读、质疑与批判“一带一路”构想的依据。结合所谓产能国际转移规律，某些言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试图向新兴发展国家和地区输出冗余的资源消耗型产能以解决自身资源消耗过度和产能过剩问题、减轻自身环境压力、实现自身产业结构升级的策略；这种以他者为代价的发展战略，显示中国正走上西方大国曾走过的依靠控制与剥削寻求地区与全球霸权的老路，因而中国的崛起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与“新帝国主义”，而“一带一路”并不会带来新的世界秩序，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罢了。可以预见的是，中非产能合作正为这两种相互承接的诠释陷阱提供了完美的素材；如果陷入其中，这一合作不仅不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双赢与共赢的典范，反而会授人以柄，削弱“一带一路”构想试图跳脱控制、剥削和霸权的老模式并塑造以平等对话、相互尊重、彼此受益、共同发展为原则的新型大国崛起路径的努力。

如果陷入其中，这一合作不仅不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双赢与共赢的典范，反而会授人以柄，削弱“一带一路”构想试图跳脱控制、剥削和霸权的老模式并塑造以平等对话、相互尊重、彼此受益、共同发展为原则的新型大国崛起路径的努力。

三、非洲工业化的历史经验

认识到上述两种基于历史经验规律可能会带来的诠释陷阱，就有必要在观念上重新梳理从中非产能合作到中非双赢与共赢的路径。这个梳理过程不能仅仅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宏观历史经验出发，而必须围绕这一合作的主体也即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状况、需求和利益展开，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这一合作的任务、意义与价值，并由此凸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相对于现下世界格局的超越

性与变革性。

站在非洲的立场上，中非产能合作对于非洲国家的最大利好就是对非洲工业化的大力支持。谈到非洲的工业化问题，很多观察者会感叹：非洲的工业化程度如此之低！工业化被认为是切实提高国家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也因此成为缓和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在这一背景下，为实现长期的发展和稳定，改变工业化水平低的局面，近年来，非洲各国纷纷将工业化定为首要的发展方向与目标，2013年非盟峰会发布的《2063年愿景》发展规划更是将工业化推为重中之重。然而，吊诡的是，非洲的低工业化水平并非由于非洲未曾开展过工业化；恰恰相反，非洲的工业化历史并不短，甚至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但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历程却未能给非洲带来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产能积累，反而有不少非洲国家依然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因此，若要使中非产能合作能切实实地促进非洲工业化，就有必要审视非洲的工业化历史，从非洲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其低工业化水平的根源。

自20世纪中期取得独立以来，大部分非洲国家都走上了相似的工业化路径：从国家领导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再到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自由化，并最终形成了以依赖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和发展服务业为特征的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由于本文篇幅有限，这里仅选取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与西非的加纳这三国的工业化历史进行案例研究，来说明非洲各国所采取的工业化路径的主要特征。

首先来看埃塞俄比亚，该国的工业化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¹ 第一阶段由二战结束起至1974年军事政变止，为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1892—1975）统治时期。在这一阶段，埃塞俄比亚分别于1958、1963和1973年制定了三个五年发展计划，推行由市场和私有部门主导的轻工业进口替代，旨在满足国内消费市场在日常必需品的需求。在践行这一工业化政策的过程中，新兴的现代轻工业部门为资本密集型的大中型外资私营企业所垄断，这一部门同传统的小规模手工业形成二元结构，既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也未能形成扎根本土的工业基础。第二阶段为军政府统治时期（1974—1991年），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将大部分大中型私营企业国有化，并出台一系列政策限制市场和私有部门的发展。1984年，军政府成立了一个中央经济计划部门，制定了一个十年计划，依靠政府投资，重点扶持进口替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然而，由

1 Chole Eshetu, "Running to Keep in the Same Place: Industrialization, 1941–1974", in Shiferaw Bekele, e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thiopia*, Dakar: CODESRIA, 1995; Bekure Woldesemait, "Industrialization Milieu, Policies, Performanc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Ethiopia: 1975 to 2000",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vol. 37, No. 1, 2004, pp. 57-81; Mulu Gebreeyesus,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in Ethiopia: Evolution and Present Experimentation*, Learning to Compete Working Paper No. 6, November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4/11/learning-to-compete/L2C_WP6_Gebreeyesus.pdf?la=en, accessed 13 March, 2016.

于受到外汇短缺、原材料供应不足和劳动力缺乏的制约，大中型国有企业长期依赖政府补贴生存，产能低下，产品质量差，难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求，也没有任何国际市场竞争力。国有企业低下的生产效率与国内不断爆发的政治冲突严重影响了埃塞俄比亚经济，为应对这一局面，军政府于1990年推行混合制经济，开始从中央计划经济逐步转向自由主义经济。第三阶段是从1991年至今，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领导的政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支持的结构调整计划，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开放市场，鼓励私有部门发展。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和制造业实现了短暂的快速增长，但到1996年，这一势头已显著放缓。1998年，埃政府实行鼓励出口战略，重点扶持高附加值农产品和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产品出口，但收效甚微。进入21世纪，埃塞俄比亚开始推行全面的工业化政策，积极扶持出口导向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尽管如此，相对于其他部门而言，埃塞俄比亚工业增长缓慢，近十年来工业产值在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未超过14%。全面工业化政策未能改变该国工业化水平低、依赖初级农产品出口和服务业的经济结构。

再来看乌干达，该国的工业化历史也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¹ 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1962年取得实质独立，其间乌干达仍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由于战后财政储备和经济状况吃紧，英国开始有意识地投资开发殖民地资源。在这一背景下，乌干达发展了两种类型的工业：一种是散布于各乡村的初级加工业，主要加工用以出口的棉花与咖啡；另一种是基于城镇的面向国内必需品消费市场的进口替代型制造业。殖民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其中得到较好落实的是《沃辛顿计划》（The Worthington Plan, 1947—1956），该计划包含了一批诸如水电站修建、矿藏勘探和铁路建设等大规模政府投资项目，为乌干达的工业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而乌干达的工业基础在独立时仍十分薄弱。乌干达经济依然主要依靠出口棉花和咖啡等初级农产品，经济结构中高附加值产业的比例非常低。第二个阶段为独立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1962—1986），其间乌干达政府制定过一个长远规划（1966—1981），旨在通过工业化来转变乌干达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根据非洲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东非整体工业化和优先发展若干产业的建议，乌干达计划以满足东非区域市场需求为目标，重点发展服装、木制品、家具、鞋、橡胶制品和钢铁等高附加值的产业，但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而进口生产技术的成本又非常高，在实际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是相对而言附加值较低且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初级食品加工

1 Henry Mwanaki Alinaitwe, Jackson Mwakali & Bengt Hansson, "Assessing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isation in construction – a case of Uganda",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vol 12, No. 3, 2006, pp. 221-229; Marios Obwona, Isaac Shinyekwa, Julius Kiiza and Eria Hisali,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y in Uganda*, Learning to Compete Working Paper No. 9, November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4/11/learning-to-compete/L2C_WP9_Obwona-et-al.pdf?la=en, accessed 13 March, 2016.

业。1971—1979年间，伊迪·阿明（Idi Amin Dada）的恐怖独裁统治和混乱经济政策破坏了乌干达脆弱的工业和经济基础，产能急剧下滑，工业几乎停滞。第三阶段从1986年至今，乌干达配合国际市场的需求，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对包括工业在内的各经济部门进行了调整，最终的结果是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下降，服务业比例快速上升，制造业所占份额极小，工业发展极度缺乏必要的机构支持和充足的技术劳动力，并主要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这种一味迎合国际市场、去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给乌干达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水平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最后来看加纳，该国工业化的历史同样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¹ 第一阶段从1960年至1983年，加纳实行政府高度保护下的内向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政府依靠大规模的公共财政支出，动用行政手段调配工业化所需的资源，建立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并对进口商品设置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土工业。采取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模式是为了减少对殖民主义势力和外国商品的依赖，同时避免过度依赖出口初级产品，从而实现自主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这种工业化模式在60年代促进了工业产值的增长，但却未能像预期的那样刺激经济增长与提升人均收入水平，这是因为该模式将资源从真正能刺激增长的领域调走了。由于集中资源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农业生产和出口受到很大限制，导致出口下滑，而加纳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满足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对原材料的需求，也不足以为企业的继续发展提供资本支持，最终在70和80年代，工业产值大幅下滑，工业化进程停滞。第二阶段从1984年至2000年，加纳转向外向型的自由主义工业化战略，在结构调整计划的支持下实施经济复苏计划，私有部门取代政府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并推行汇率市场化以及金融业和利率自由化，取消价格和物资配给管制，废除进口配给制，私有化国有企业等政策。这些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举措虽然激活了加纳工业部门的活力，但汇率市场化导致加纳塞地贬值，而长期受政府保护的进口替代型工业部门在转向出口型工业部门，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无法适应激烈的贸易竞争，致使加纳工业化水平不升反降。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由于加纳制造业无法应对国际市场竞争，进而持续低迷，工业发展战略转为扶持由私有部门领军的矿产开采和加工业。

以上三个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虽各不相同，但大致反映出一些这种工业化路径的共性。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都从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开始，这一方面是借

1 A. Baah-Nuakoh, *Studies on the Ghanaian Economy: The Industrial Sector*, vol. III. Accra: Woeli Publishing Services, 2003; Jasper Abembia Ayelazuno, "Neoliberalism and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in Ghana: A Case for State-led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49, No. 1, 2014, pp. 80-99; Charles Ackah, Charles Adjasi and Festus Turkson, *Scoping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y in Ghana*, Learning to Compete Working Paper No. 18, November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4/11/learning-to-compete/L2C_WP18_Ackah-Adjasi-and-Turkson.pdf?la=en, accessed 13 March, 2016.

鉴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通过进口替代模式来发展民族工业、打下工业基础、实现强国目标，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在经济领域践行反殖民和民族独立理念的需要，通过实现生活必需品的自主生产和供应，摆脱对殖民宗主国和世界体系核心国家的依赖。然而，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本身对资本和技术的需求较高，并不符合工业基础薄弱的非洲国家的资源禀赋，因而带来了依赖外资、依赖进口材料和技术、产能低下、产品质量差和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问题，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工业化模式。当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失败后，这些非洲国家先后转向了经济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本国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开始走私有部门引领的外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转向并不是非洲国家的自主选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世界体系核心国家所支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设计的结构调整计划。经济自由化等政策转向，是获得这两大组织所提供的国际贷款的前提条件。在未能仔细考察本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的情况下，非洲各国盲目开放市场，推行汇率市场化，参与国际市场运作，最终的结果是：货币贬值、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高附加值制造业表现低迷。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洲国家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去工业化，经济发展开始越来越依靠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或（和）发展服务业。这种去工业化的趋势让非洲国家失去了通过符合自身资源禀赋的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升级的可能性，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并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继续依附国际市场，丧失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四、自主工业化与被动工业化

上述非洲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一直以来，非洲基本上遵循了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被动工业化的工业化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工业化的路径不是自然形成的，很大程度上也不是由非洲国家的民众自主选择的，而是在统治精英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圈层形成的利益与智识勾连下，或迫于该体系所施加的压力下，对西方工业化强国历史发展经验的直接照搬或刻意模仿。为深入理解这种被动工业化模式，这里需要结合两个针锋相对的社会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和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来重新认识非洲的工业化历史。

现代化理论是二战后兴起于美国的一系列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如何从传统社会发展成现代化国家的理论。不同的现代化理论有不同的着眼点（政治体制、经济和文化等）和不同的发展模型，但它们毫无例外都是基于西欧和美国的发展经验建立起来的。比如，经济领域里，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在1960年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将经济发展视作是一个依次由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

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线性演进过程。¹ 这个四阶段论带有鲜明的西欧和美国的色彩，但却被总结成一个普世的发展路径，并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在非洲工业化的历史中，无论是20世纪中期普遍采取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还是20世纪80年代所奉行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参与设计的、以市场化、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为特征的结构调整计划，都体现了这种现代化理论所内含的将欧美经验普世化的逻辑。

从非洲的工业化实践来看，遵循这一逻辑的工业化路径显然是失败了。站在批判立场上的依附论为这一失败提供了解释。依附论认为，现代化理论在推广普世发展模式时，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所处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从拉美失败的发展经验出发，依附论指出，殖民主义式的权力关系依然统治着后殖民时代的世界体系与全球分工；世界体系中存在核心、次边缘与边缘等不同层级的圈层，核心圈层的资本集团通过勾连边缘圈层的统治精英，榨取边缘圈层的农民和工人阶级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² 由于这一层级剥削关系的存在，边缘圈层的中低收入国家只要进入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市场，就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核心圈层资本集团的控制与剥削，无法实现自主发展，而长期依附于核心圈层的结果就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在非洲的工业化历史中，我们看到非洲国家在开放市场、进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每次发展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尝试都难以适应全球市场的竞争，最后都不得不继续生存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依靠出口自然资源和低附加值初级产品来发展经济，过度消耗资源的同时却无法实现工业基础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最终陷入去工业化的局面。

非洲现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业化，而是走出现代化理论所内含的发展逻辑以及依附理论所描述的结构性窠臼，从被动工业化走向自主工业化。

由此看来，非洲现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业化，而是走出现代化理论所内含的发展逻辑以及依附理论所描述的结构性窠臼，从被动工业化走向自主工业化。实现后一种模式，需要非洲国家仔细分析各自的资源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独立自主地选择工业化的优先产业与发展路径；还需要非洲国家与社会各阶层全方位地参与工业化的决策和实践，并从工业化过程中受益；也需要非洲国家积极应对世界体系中核心与边缘的权力层级关系，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大力促进产业多元化，建设坚实的工业基础。

1 W.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2 Christopher Chase Dunn,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s Theories" in George Ritz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Malden: Blackwell, 2007, pp. 1060-1062.

五、中国的角色

鉴于非洲对自主工业化路径的追寻，中国需要重新认识中非产能合作的方式和内容。中国不能仅仅致力于将剩余的产能和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洲国家，这种合作方式与其说是对等的产能转移，不如说是卸下阻碍经济结构升级的包袱和转嫁经济高速发展的负效应。这种做法会带来两种不利影响。其一，非洲国家如迫于全球市场分工体系的压力，复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来承接中国的剩余产能，这从本质上来讲依然是一种生搬硬套他国经验的被动工业化的路径，很有可能无法真正实现工业化。其二，不能帮助非洲实现真正发展的中非产能合作，会坠入本文先前所述的两种经验主义诠释陷阱中，伤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世界的积极意义。中国应切实地以平等合作的方式，鼓励中非政、商、民各界的相互沟通与对接，以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产能的对接，但仅做到这一步也是不够的。在中非的产能合作中，中国最应该重视的，是总结并向非洲国家传递自身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积极经验，特别是在保证自主性的前提下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接的发展经验。这些经验，既包括具体的做法，比如经济特区制度（近年来，中国积极向非洲推介经济特区的经验，鼓励中国企业同非洲国家合作建立经贸合作区，目前已建成包括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毛里求斯晋非合作区、尼日利亚广东经济贸易合作区、尼日利亚莱基基自贸区、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和阿尔及利亚中国江铃经济贸易合作区在内的20多个经贸合作区或经贸园区¹）、金融汇率监管制度和国际贸易谈判等，也包括发展理论的总结和发展理念的梳理。这将有助于非洲国家利用中国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历史教训和现实情况，逐步摸索适用于自身的自主工业化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非产能合作的双赢和共赢就具有了两重意义：一是有利于双方真正实现工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二是有利于双方共同探索以自主发展和相互尊重为前提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以改变近代以来统治世界体系的层级制、剥削式的权力关系。

在中非的产能合作中，中国最应该重视的，是总结并向非洲国家传递自身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积极经验，特别是在保证自主性的前提下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接的发展经验。

1 参见贾晓静：《中非经贸合作区：助力非洲筑巢引凤》，《国际商报》2016年1月4日第C02版；乔慧娟：《中非经贸合作区：对非投资合作新模式》，《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5年第5期，第29页；唐晓阳：《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合作区发展浅析》，《西亚非洲》2010年第11期，第18页。